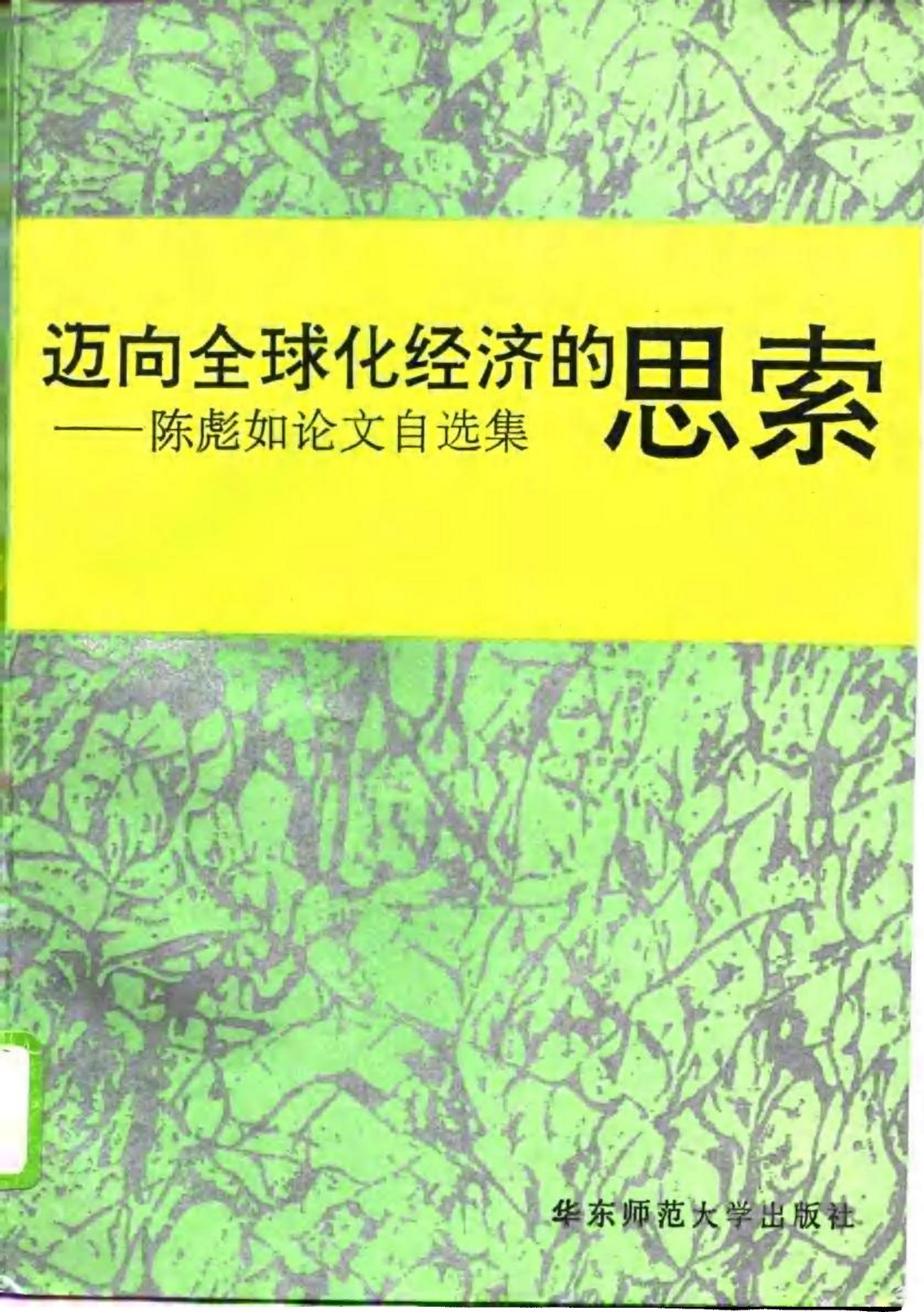




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思索**

——陈彪如论文自选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思索

——陈彪如论文自选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思索

——陈彪如论文自选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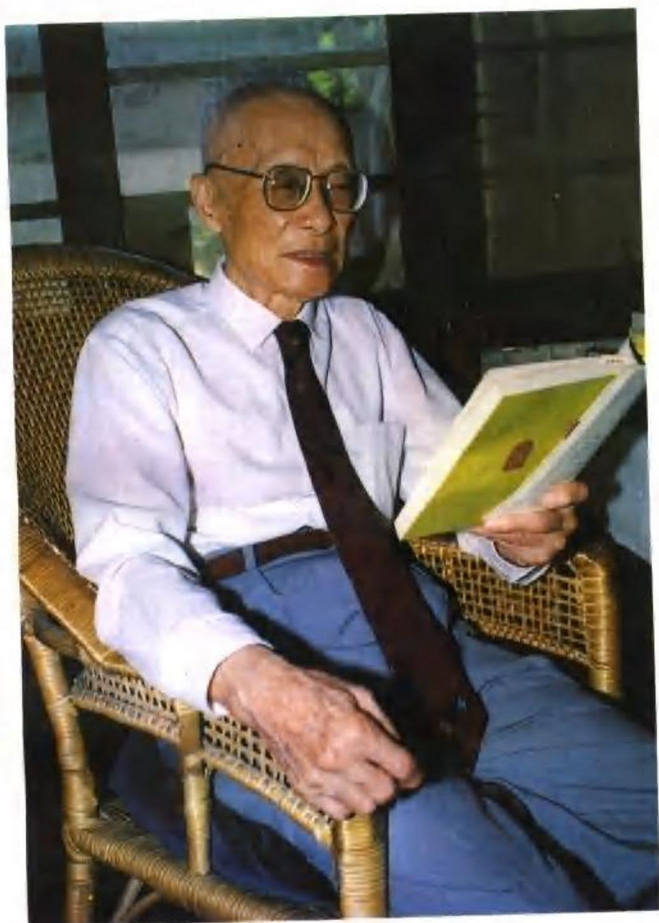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插页: 6 字数: 5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本

ISBN7-5617-1340-1 / F·053 定价: (平)29.80元
(精)32.30元



陈彪如教授近影

代序：不被岁月所击倒，不为时代所淘汰

八十自述

人逾古稀，总爱回首往事，回顾我一生治学之路，每一段每一程都有一个既定目标，为了这个目标而孜孜不倦地追求，勤勤恳恳地耕耘。如果说前70年的人生并非虚度的话，那么，成功与收获都应归结于几十年对人生目标的坚决追求和为达到目标而付出的巨大辛劳。

少时就立下攀登科学高峰的意向

我原名陈友炳，祖籍福建福州，1910年12月10日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铁路局工作了几十年，由于不善钻营，一生抑郁不得志，因而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要子女刻苦学习，力求上进。他在夜晚常给孩子们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以激励子女奋发学习。这种情景在我幼时的头脑里深深地扎了根，对我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9岁时全家移居河北省周口店，我进了一家私塾，在私塾先生异常严厉的管教下，一本一本地背诵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线装古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此光阴流逝五载。私塾先生对学生学习的苛刻要求，使我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他的教学方法是不科学的，但治学的严谨态度和严格要求却使我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这使我一生都受益非浅。时隔六十多年，每次想起幼时学习的情景，我仍深深地

• i •

怀念那位对我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私塾老师。

1924年我14岁时在河南信阳上中学,两年后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在“科学救国论”的影响下,我对数理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从数理化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还学到了研究方法,这就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逻辑思维。1929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决定在这座学术空气比较浓厚的全国有名的高等学府里,攻读政治学。对于选择这样一个专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国际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弱肉强食,强国大国任意欺压弱国小国,战争不断,人类互相残杀。在国内,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处处可见。世界扰攘不安,国家多灾多难,我耳闻目睹了国内外的政治状况,认识到要改变人类命运,必须研究政治,政治不上轨道,一切都无从谈起。我急于从政治学的角度寻找一些答案,想找到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找到使各国和平相处,避免战争的良方。还想找到一种使人民安居乐业,共享繁荣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抱着这样一个目的,我开始了四年政治学的学习研究生涯,攻读了几十门政治学课程:政治思想史、比较宪法、国际关系、国际公法……。还选修了一些经济学的课程,因为政治和经济是不可分的。教授们认真负责的讲课,使我学到很多知识,这对我了解世界,了解资本主义,了解旧中国有很大帮助。但是,至于如何改造旧社会,在当时我的思想里,还不清楚,教授们没有,也不可能为我指明一条现成的路,要靠自己去探索,去寻找。我利用课余时间,埋头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地追求真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全面侵略,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愤,许多学者著文抨击,给中国人民以有力支持。我和几个同学广泛收集各国报刊资料,编写了《国际舆论与东北问题》一篇长文,在天津《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借以鼓舞斗志。日本军阀的侵略,国际联盟的失败,使我认识到国际政治的严重性、复

杂性,要建立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谈何容易,即使能够找到一两个改革政治的方案,充其量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就象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那样。严酷的现实打破了我那幼稚的梦境,但我没有气馁,继续勤奋学习,努力读书,还是想从理论上掌握这个混乱的世界,从书本上找到改造世界的良方。

1933年,我在清华大学毕业,进入研究院继续深造。过了一年多,由于家庭负担过重,不得不中途辍学,走向社会。这时期,我到过很多地方,干过好多种实际工作,接触了许多不同阶层的人们。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广大人民在贫苦生活中挣扎的景象,以及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几年的社会实践,为我增加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活生生的知识,我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我觉得青年人应当有远大的抱负,但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我认为还要多读书、多观察,多接触社会。于是我一边参加工作,一边读书研究,继续寻求科学和真理,希望获得真知,逐步踏入科学宫殿,为祖国富强贡献智慧和才能。1937年,抗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炮火打断了我的研究工作,我毅然投笔从戎,积极加入抗日救亡的行列。我从南京辗转入川,一路上看到了日本军阀的凶狠残暴,也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黑暗,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国共合作,团结御侮,又使我受到很大鼓舞,我认识到,只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才能取得胜利。

我参加了抗日战争,看到了国民经济因连年战争遭受严重破坏的现实,深深感到,战后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根本无法改变千疮百痍的中国经济面貌。从这个时候起,我越来越注意经济问题,决计要找到一种先进的经济理论,作为改变中国经济状况的依据。我对理论研究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总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

为人类作出贡献。我想，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只能作短暂的逗留，只有献身社会，才能真正理解短暂生命的意义。我要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攀登科学高峰，为祖国、为人类作出贡献。这是一生中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我在清华园内苦读四年，学习了政治学，但仍觉得才疏学浅，自忖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还需博采百家之长，吸取各家养料，加以融会贯通，才能走上真正的科学道路。

专攻经济学：哈佛大学确定了我的人生走向

1944年，我获得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进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哈佛大学是美国的最高学府，荟集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熊彼得、汉森、哈勃勃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里昂惕夫等人。我毅然决定，在这座令人向往的学府里，跟从这些久享盛名的经济学大师，专心致志地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以寻找拯救中国经济的理论。我的这一重大决定，使我从此跻身经济学界，走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迄今，弹指已近五十载。

50年来，我在经济学领域遨翔驰骋，多次享受收获的喜悦和欢欣。然而，有谁知道，我跨入经济学大门的第一步时，付出了多少艰辛，克服了多少困难啊！首先，当时国内与国外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国家凯恩斯理论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对经济进行宏观分析，一般都用图形和数学来进行论证，而国内学术界还停留在马歇尔经济学时代，与西方脱节，这就更加显得西方经济理论玄奥神秘，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其次，原来希望从课本学习可以系统掌握经济学知识。可是这些大师都是著名教授学者，忙于著书立说，不愿花功夫备课，讲授时往往信口开河，谈些个人见解，没有章节，不成系统，学习遇到问题只得靠自己苦思冥想，寻找正

确答案。再次，哈佛大学特别注重学生自学和自己动手。这当然无可非议，大学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放在首位，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遇有问题，无人辅导，也增加了学习困难。在近乎无师的情况下，我以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努力钻研。我的座右铭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多少个周末，多少个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不去游玩，不思休息，埋头在书斋。根据学校提供的参考书目，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一本一本研读。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科学研究好象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我也很赞同宋人黄山谷“泛览群书，不如精于一也”的观点。书籍浩如烟海，即使如何争分夺秒，也不可能将所有参考书都从头读到尾。我采取了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方法。对名著，我采取精读的方法，反复阅读，仔细琢磨，掌握其精髓。对一般参考书，我采取泛读的方法，在广泛的浏览中，常常收到“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我既“破万卷”，又“攻一书”，使两种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决不偏废其一，这使我的学业大有长进。这种治学之道在以后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坚持使用，获益非浅。在哈佛大学的两年，确定了我的人生走向，使我从此跨入经济学的研究殿堂。

经过发愤攻读，我基本掌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正经历着新旧交替的过程，我对新旧两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所谓正统派经济学家，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如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的适当配置，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应当研究的课题。同时也感到惊讶，这些正统派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现实世界。他们对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分析，竟然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于均衡，而且达到最适度均衡的结论。他们把一种假想的理论境界当做正常状态，理论完全与实际脱节。3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大量失业和经济长期萧条

的现象，他们竟熟视无睹，结果，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宣告破产，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我认为，凯恩斯比他的前辈要现实些，他承认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有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提出了一套阐述经济失调的理论，凯恩斯的信徒吹嘘凯恩斯的理论是西方经济思想的一次“革命”。对于这个理论，我感到很新鲜，不管怎样，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统治着经济学界，而且支配着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我认为有必要研究它。留美期间，我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很熟悉，还没有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不可能对凯恩斯主义作出科学的剖析。当时我对凯恩斯经济学只有两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凯恩斯否定“萨伊定律”，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种观点比较合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凯恩斯的经济纲领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一）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来控制危机和失业；（二）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在于刺激社会需求；（三）刺激社会需求的中心在于鼓励资本家的乐观情绪；（四）鼓励资本家乐观情绪的根本办法是扩大资本家的利润，增加投资。但是，凯恩斯主张干预政策，可以推迟危机，减少失业，但不能解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因为用投资来弥补收入与消费间的差距，会有惊人的内在矛盾。一个国家不可能继续不断地投资来生产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而不考虑产品的最后销路——人民的消费，归根到底，生产是以消费为转移的。这就产生一种两难困境。因为投资增加后，随后生产进一步扩大，势必使明天的差距更大，于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对于这一点，连凯恩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说：“每一次我们通过投资的增加来获得今天均衡的时候，我们却增加了明天求得均衡的困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最后，他只得说，从长期来讲，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凯恩斯主义的说服力

并不强，它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罗宾逊夫人指出：关于现代经济的毛病，历来的经济学都没有能够予以充分的解答。……正确的解答，是要经济学的思想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才能产生。这几句话说明了包括凯恩斯主义在内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所处的困境。不过，与传统庸俗经济学相比，凯恩斯的《通论》还是个发展：（一）他着重研究影响国民经济绝对水平（总产品、就业量）的各种因素，可以加深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与理解；（二）他重视宏观分析，创立了许多宏观经济概念与分析工具，这就为具体研究消费、储蓄、投资、就业和国民收入等范畴奠定了基础；（三）凯恩斯进一步推动了经济计量学方法的运用，将理论分析、统计检验和方案论证三方面融合为一体，相辅相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理论同实际结合起来了。第二，凯恩斯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出发点的，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它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我感到苦闷，因为我攻读经济学的动机，是探索经济救国的道路，而废寝忘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结果，却使我大失所望。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要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寻找解决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1946年底，我在哈佛大学读完硕士学位，毅然回国，被聘为暨南大学经济学教授，不久兼任经济系主任。我本来想，在学校教书，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了，我打算双管齐下，一方面翻译几本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作，同时写一些评介的文章和书籍，使国内学术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我认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还是必需的。我们可以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另一方面，我打算在评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对症下药，改变中国经济的落后面貌。尽管我抱着一个热烈而单纯的愿望，可是事与愿违。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我不得不为生活操心，无

法静下心来开展研究工作，我的幻想破灭了。中国学生在国外读书时，一般都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一旦回国，就逐渐落后，甚至一事无成。在旧社会，知识分子受到种种摧残，实在令人痛心。我开始认识到，没有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科学文化是很难发展的。我的理想，只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变成现实。

穿越岁月的空间，潜心研究评介西方经济学名著

解放后，暨南大学撤销，我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任教，担任经济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在政治教育系任教授，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这时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思想认识有了变化，过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没有找到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找到了。我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后，就着手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我写了两本书：《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1957年）和《什么是凯恩斯主义》（1960年）。《什么是凯恩斯主义》已出了三版，1975年一位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日本学者称这本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凯恩斯主义的一本书，是中国出版的有关凯恩斯文献中最详细的一本。我在这本书的“凯恩斯主义与战后美国经济”一节中指出，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花费的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威胁：“人人都清楚，今天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从缓慢的通货膨胀变成快马加鞭式的通货膨胀。”事实完全证明了我的论断。我体会到，研究经济问题，要有正确的观点，才能进行正确分析，得出正确结论。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膨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发生了危机，有人认为，它彻底破产了。在我看来，这句话未免言之过早。事实上，自1974年以后，美英等国政府

一直是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之间来回“走钢丝”，当通货膨胀严重时，它们就要采取货币主义政策，当经济衰退严重时，它们又会采取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我认为，在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变革以前，凯恩斯主义还要起一定的作用，我们要密切注意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动向。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长时期来，教条主义在我国很严重，学术探讨受到限制，一些实际问题硬搬苏联模式又难以解释清楚，致使我国经济学界与国外经济学界完全处于隔离状态，对西方经济理论研究处于停顿状态。我当时就认为，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有两个方面不能放弃：（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根据其经济理论制定的，如美国政府过去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以凯恩斯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后来又改为货币主义。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的理论根据，不知道其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如何发展变化，也就无法提出切合实际的对策。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二）全盘否定西方经济理论，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科学地分析、评论它们，因为西方经济理论也有可资借鉴、参考的地方。所以不能与西方经济学界完全隔离。基于上述想法，我准备写一二本专著，评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学术界动荡不宁，写书非常困难，我只得以翻译名著的形式向我国经济学界介绍西方经济思想。我觉得，要实现一个目标，并非只有一条路。著述有风险，翻译总可以吧。我先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米克所著《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这是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和艰苦探索写出的一部专著。这本书对我们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深刻内容，加强对资产阶级各种庸俗价值理论的批判，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类著作在国内却不多见。我立志为中国经济学界翻译介绍一批西方经济学名著。志向确定后，我不论寒

冬酷暑，坚持翻译，十多年不敢懈怠。即使在最艰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放下笔。我总共翻译出版了7本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作，共计230万字，有[美]菲歇尔《利息理论》(1959年)，[英]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1963、1979年)，[美]狄拉德《凯恩斯经济学评述》(1963年)，[美]勒纳《统制经济学》(1963年)，[英]李特尔《福利经济学评述》(1965、1981年)，[美]加德纳·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1981年)，[英]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1982年)，其中《利息理论》等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最早翻译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著作。这些书在西方各国是很流行的，作者大多数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我将这些西方经济学名著翻译出版，为我国经济学界积累了一批可供参考的宝贵财富。

“文化大革命”中，我像其他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我的所有译作都被当作毒草进行批判，家被抄了，著作权被剥夺了，文稿资料散失殆尽，整个研究计划全部成了泡影。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了工作。严冬已过，枯木逢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没有气馁，没有丧失信心，只是感到浪费了10年宝贵的时间，实在太可惜，我振作精神，重新开始研究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形势的发展，需要理论工作者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新的形势，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人生需要不断开拓：在中国国际金融

处女地上辛勤耕耘

我历来主张，理论研究要与实践结合。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理论研究更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我感到有

一种紧迫感,在许多领域我们落后人家太多了。我决定加紧对国际金融的研究,以尽快开拓这一新兴学科。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国际金融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其次,国际金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应尽快填补这块空白。我是最早建议开展国际金融研究的倡导者之一。研究国际金融,对我来说是研究方向的转换,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心血,无疑将付出更多的辛劳。但我认为人生就是需要不断开拓,在开拓中展示人生价值。早在60年代国际金融学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在国外兴起不久,我就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托着手编写世界经济教材中国际金融部分,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这项工作才不得不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继续国际金融的教学和研究,选择了国际货币制度这个核心问题作为突破口。先后在《当前国际货币制度问题》、《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国际储备体系的最新发展》等7篇论文中阐述了我对国际货币制度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较大反响。我认为,在进入80年代时,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一系列困难的挑战,如汇率的剧烈波动,国际储备的多样化,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和国际债务危机的发展等,这就迫切要求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合作,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货币关系和一种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由于黄金不足,必须寻找一种集体创造的储备货币作为黄金的补充,使世界货币的实体与形式统一起来。这样一种货币体系,就可以在国际控制下,保证国际储备的适当增长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与发展。1983年,我发表在上海市社联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上的《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看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文,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国际货币问题的结晶。文章从货币的本质和形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了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提出“特别提款权与黄金挂钩,实行一种新型的金本位制,重新建立比较稳定的

货币体系”的观点，这一观点体现了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学术上的创新精神，因而该文获得上海市社联颁发的优秀学术成果奖。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论述，在我国国际金融学科中具有一定地位，这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国际金融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学者，我对研究工作始终保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从不随意附和别人的观点，即便这种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我对每一种经济现象都要深入分析，冷静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逻辑性较强，富有启发意义，引起经济学界同行的重视。1981年3月，在杭州召开世界经济讨论会上，我提交了题为《东西方货币关系展望》的论文，这篇论文预测，东欧国家将逐步向国际金融机构靠拢，长期同西方隔绝的状况将要结束。不出一年，匈牙利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波兰等国也相继提出加入的申请。1983年初，西方经济界忧心忡忡，认为发展中国家严重的债务危机很快就会酿成一场全面的国际金融危机，国内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我认为，金融属于流通领域，它的发展和变化应该是同经济周期相联系的，尽管国际债务危机严重，但世界经济却正在走出危机，开始复苏，国际金融危机在短期内不会爆发。6月初，我在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就此作了专题报告。以后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我的这一判断。

我研究国际金融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坚持为现实的经济建设服务。多年来我就如何更好地贯彻对外开放的政策，繁荣我国经济问题，向国家和地方的政府部门、经济部门提供了一些国际金融咨询建议。1984年底，在上海市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建立上海金融市场、振兴上海经济”的论文，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论证上海发展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如建立证券市场，开放外汇市场，改革银行体制，开展国际金融市场业务等。不久，在有关太平洋地区发展前景与中

国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我又提出了“国际金融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对外金融战略”的论文,主张逐步恢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强同香港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这些建议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我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还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被决策机构所采纳,我被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聘为特约研究员,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聘为顾问,实际上我还和其他研究机构、学术团体有密切的联系,献计献策,只是深感心余力绌而已。尽管学术界有时动荡不宁,我力求人老志坚,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人生能有几回搏:建立科研群体,攻克科研难关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金融学是我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之奋斗不息的最大心愿。为此,我付出全部心血,并携同一批同行共同为开拓这个新的研究领域创立这门新兴学科而奋斗。1979年,在我的主持下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世界经济研究室。根据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和研究规划,组织一批教学科研人员,着重研究国际金融,我担任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发扬理论研究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传统,把应用研究作为研究室的中心。几年来,研究室在为对外开放和发展外贸服务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攻克了许多难关,已经完成对我国经济活动有较大影响的研究项目,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为国家合理确定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提供咨询。多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影响了对外贸易。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合理地确定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是当前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1982年底,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负责同志,委托我们研究室提供咨询意见。我接受任务后,立